

胡適文存



中華民國二十年十二月初版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六月十七版

胡適文存

(洋裝兩冊實價二元八角)

(平裝四冊實價二元二角)

郵費七分半

有著作權
必究印

著者 胡適

印刷者兼 亞東圖書館

發行所 亞東圖書館
上海五馬路棋盤街西首

分售處 各省各大書店

胡適文存卷四

歸國雜感

我在美國動身的時候，有許多朋友對我道：「密斯忒胡，你和中國別了七個足年了，這七年之中，中國已經革了三次命，朝代也換了幾個了。真個是一日千里的進步。你回去時，恐怕要不認得那七年前的老大帝國了。」我笑着對他們說道：「列位不用替我擔憂。我們中國正恐怕進步太快，我們留學生回去要不認得他了，所以他走上幾步，又退回幾步。他正裏那裏回頭等我們回去認舊相識呢。」

這話並不是戲言，乃是真話。我每每勸人回國時莫存大希望：希望越大，失望越大。所以我自己回國時，並不會懷什麼大希望。果然船到了橫濱，便聽得張勳復辟的消息。

如今在中國已住了四個月了，所見所聞，果然不出我所料。七年沒見面的中國還是七年前的老相識！到上海的時候，有一天有一位朋友拉我到大舞台去看戲。我走進去了兩點鐘，出來時候，對我的朋友說道：『這個大舞台真正是中國的一個絕妙的縮本模型。你看這大舞台三個字豈不很新？外面的房屋豈不是洋房？裏面的座位和戲台上的布景裝潢又豈不是西洋新式？但是做戲的人都不過是趙如泉沈韻秋萬籟燈何家聲何金壽這些人。沒有一個不是二十年前的舊古董！我十三歲到上海的時候，他們已成了老脚色了。如今又隔了十三年了，却還是他們在台上撐場面。這十三年造出來的新角色都到那裏去了呢？你再看那台上做的舉鼎觀畫。那祖先堂上的布景豈不很完備？只是那小辭蛟拿了那老頭兒的書信，就此跨馬加鞭，却忘記了台上布的最是一座祖先堂！又看那餉四進士。台上布景，明明有了門了，那宋士杰却還要做手勢去關那沒有門的上公堂時還要跨那沒有的門檻！你看這二十年前的舊古董，在二十世紀的小舞台上做戲；裝上了二十世紀的新布景，却偏要做那二十年前的舊手脚！這不是一副絕妙的中國

現勢圖嗎？」

我在上海住了十二天，在內地住了一個月，在北京住了兩個月，在路上走了二十天，看了兩件大進步的事：第一件是「三砲台」的紙烟，居然行到我們徽州去了；第二件是「撲克」牌居然比麻雀牌還要時髦了。「三砲台」紙烟還不算希奇，只有那「撲克」牌何以會這樣風行呢？有許多老先生向來學A, B, C, D, 是很不行的，如今打起「撲克」來，也會說「恩德」、「累死」、「接客倭彭」了！這些怪不好記的名詞，何以會這樣容易上口呢？他們學這些名詞這樣容易，何以學正經的A, B, C, D, 又那樣蠢呢？我想這裏面祇有可以研究的道理。新思想行不到徽州，恐怕是因為新思想沒有「三砲台」那棟中吃罷？A, B, C, D, 不容易教，恐怕是因為教的人不待其法罷？

我第一次走過四馬路，就看見了三部教「撲克」的書。我心想「撲克」的書已有這許多了，那別種有用的書，自然更不少了，所以我就花了一天的工夫，專去調查上海的出版界。我是學哲學的，自然先尋哲學的書。不料這幾年來，中國竟可以算得沒有出過一

部哲學書。找來找去，找到一部中國哲學史，內中王陽明佔了四大頁，洪範倒佔了八頁！還說了些『孔子既受天之命』、『與天地合德』的話。又看見一部韓非子精華，刪去了五蠹和顯學兩篇，竟成了一部韓非子精粕了。文學書內，只有一部王國維的宋元戲曲史是很好的。又看見一家書目上有翻譯的蕭士比亞劇本，找來一看，原來把會話體的戲劇，都改作了聊齋志異體的敘事古文！又看見一部婦女文學史，內中蘇蕙的迴文詩足足佔了六十頁！又看見飲冰室叢著內有墨學一書，我是喜歡看看墨家的書的人，自然心中很高興。不料抽出來一看，原來是任公先生十四年前的舊作，不曾改了一個字！此外只有一部中國外交史，可算是一部好書，如今居然到了三版了。這件事還可以使人樂觀，此外那些新出版的小說，看來看去，實在找不出一部可看的小說。有人對我說，如今最風行的是一部新華春夢記，這也可想見中國小說界的程度了。

總而言之，上海的出版界，中國的出版界——這七年來簡直沒有兩三部以上可看的書！不但高等學問的書一部都沒有，就是要找一部輪船上火車上消遣的書，也找不出！

（後來我尋來尋去，只尋得一部吳稚暉先生的上下古今談，帶到蕪湖路上去。）我看
了這個怪現狀，真可以放聲大哭。如今的中國人，肚子餓了，還有些施粥的廠把粥給他們
吃。只是那些腦子叫餓的人可真沒有東西吃了。難道可以把些九尾龜十尾龜來充飢
嗎？

中文書籍既是如此，我又去調查現在市上最通行的英文書籍。看來看去，都是些什
麼蕭士比亞的威匿思商麥克白傳，阿狄生的文報選錄，戈司密的威克斐牧師，歐文的見聞
雜記……大概都是些十七世紀十八世紀的書。內中有幾部十九世紀的書，也不過是
歐文迭更司司各脫麥考來幾個人的書，都是和現在歐美的新思潮毫無關係的。怪不得
我後來問起一位有名的英文教習，竟連Bernard Shaw的名字也不會聽見過，不要說
Tchekoff和Andreyev了。我想這都是現在一班教會學堂出身的英文教習的罪過。
這些英文教習，只會用他們先生教過的課本。他們的先生又只會用他們先生的先生教
過的課本。所以現在中國學堂所用的英文書籍，大概都是教會先生的太老師或太太老

師們教過的課本！怪不得和現在的思想潮流絕無關係了。

有人說，思想是一件事，文學又是一件事，學英文的人何必要讀與現代新思潮有關係的書呢？這話似乎有理，其實不然。我們中國人學英文，和英國美國的小孩子學英文是兩樣的。我們學西洋文字，不單是要認得幾個洋字，會說幾句洋話，我們的目的在於輸入西洋的學術思想。所以我以為中國學校教授西洋文字，應該用一種『一箭射雙鵰』的方法，把『思想』和『文字』同時並教。例如教散文，與其用歐文的見聞雜記，或阿狄生的文報選錄，不如用赫胥黎的進化雜論。又如教戲曲，與其教蕭士比亞的威匿思商，不如用Bernard Shaw的Androcles and The Lion，或是Galsworthy的Strife或Jus ice。又如教長篇的文字，與其教麥考來的約翰生行述，不如教彌爾的羣己權界論……我寫到這裏，忽然想起日本東京丸善書店的英文書目。那書目上，凡是英美兩國一年前出版的新書，大概都有。我把這書目和商務書館與伊文思書館的書目一比較，我幾乎要羞死了。我回中國所見的怪現狀，最普通的是『時間不值錢。』中國人吃了飯沒有事做，不

是打麻雀，便是打『撲克』。有的人走上茶館，泡了一碗茶，便是一天了。有的人拿一只鳥兒到處逛逛，也是一天了。更可笑的是朋友去看朋友，一坐下便生了根了，再也不肯走。有事商議，或是有話談論，倒也罷了。其實並沒有可議的事，可說的話。我有一天在一位朋友處有事，忽然來了兩位客，是□□館的人員。我的朋友走出去會客，我因為事沒有完，便在他房裏等他。我以為這兩位客一定是來商議這□□館中什麼要事的。不料我聽得他們開口道：『□□先生，今回は打津浦火車來的，還是坐輪船來的？』我的朋友說是坐輪船來的。這兩位客接着便說輪船怎樣不便，怎樣遲緩。又從輪船上談到鐵路上，從鐵路上又談到現在中交兩銀行的鈔洋跌價。因此又談到梁任公的財政本領，又談到梁士詒的行蹤去迹……談了一點多鐘，沒有談上一句要緊的話。後來我等的沒法了，只好叫聽差去請我的朋友。那兩位客還不知趣，不肯就走。我不得已，只好跑了，讓我的朋友去領教他們的『二梁優劣論』罷！

美國有一位大賢名弗蘭克林(Benjamin Franklin)的，曾說道：『時間乃是造成生

命的東西。」時間不值錢，生命自然也不值錢了。上海那些揀茶葉的女工，一天揀到黑，至多不過得二百銅錢，少的不過得五六十錢。茶葉店的夥計，一天做十六七點鐘的工，一個月平均只拿得兩三塊錢。還有那些工廠的工人，更不用說了。還有那些更苦、更苦痛的工作，更不用說了。人力那樣不值錢，所以衛生也不講究，醫藥也不講究。我在北京上海看那些小店舖裏和窮人家裏的種種不衛生，真是一種黑暗世界。至於道路的不潔淨，瘟疫的流行，更不用說了。最怪的是無論阿貓阿狗都可掛牌醫病，醫死了人，也沒有怨恨，也沒有人干涉。人命的不值錢，真可算得到了極端了。

現今的人都說教育可以救種種的弊病。但是依我看來，中國的教育，不但不能救亡，簡直可以亡國。我有十幾年沒到內地去了，這回回去，自然去看看那些學堂。學堂的課程表，看來何嘗不完備？體操也有，圖畫也有，英文也有，那些國文、修身之類，更不用說了。但是學堂的弊病，却正在這課程完備上。例如我們家鄉的小學堂，經費自然不充足了，却也要每年花六十塊錢去請一個中學堂學生兼教英文唱歌。又花二十塊錢買一架風琴，

我心想，這六十塊一年的英文教習，能教什麼英文？教的英文，在我們山裏的小地方，又有什麼用處？至於那音樂一科，更無道理了。請問那種學堂的音乐，還是可以增進『美感』呢？還是可以增進音樂知識呢？若果然要教音樂，爲什麼不去村鄉裏找一個會吹笛子的唱崑腔的人來教？爲什麼一定要用那實在不中聽的二十塊錢的風琴呢？那些窮人的子弟學了音樂回家，能買得起一架風琴來練習他所學的音乐知識嗎？我真是莫名其妙了。所以我在內地常說：『列位辦學堂，儘不必問教育部規程是什麼，須先問這塊地方上最需要的是什麼。譬如我們這裏最需要的是農家常識，蠶桑常識，商業常識，衛生常識，列位却把修身教科書去教他們做聖賢！又把二十塊錢的風琴去教他們學音樂！又請一位六十塊錢一年的教習教他們的英文！列位且自己想想看，這樣的教習，造得出怎麼樣的人才？所以我奉勸列位辦學堂，切莫注重課程的完備，須要注意課程的實用。儘不必去巴結視學員，且去巴結那些小百姓。視學員說這個學堂好，是沒有用的。須要小百姓都肯把他們的子弟送來上學，那才是教育有成效了。』

以上說的是小學堂，至於那些中學堂，更可怕了。我遇見一位省立法政學堂的本科學生，談了一會，他忽然問道：「聽說東文是和英文差不多的，這話可真嗎？」我已經大詫異了。後來他聽我說日本人總有些島國的習氣，忽然問道：「原來日本也在海島上嗎？」……這個固然是個極端的例。但是如今中學堂畢業的人才，高又高不得，低又低不得，竟成了一種無能的游民。這都由於學校裏所教的功課，和社會上的需要毫無關涉。所以學校只管多，教育只管興，社會上的工人，夥計，帳房，警察，兵士，農夫，……還只是用沒有受過教育的人。社會所需要的是做事的人才，學堂所造成的是不會做事又不肯做事的人才，這種教育不是亡國的教育嗎？

我說我的「歸國雜感」，提起筆來，便寫了三四千字。說的都是些很可以悲觀的話。但是我却並不是悲觀的人。我以為這二十年來中國並不是完全沒有進步，不過惰性太大，向前三步又退回兩步，所以到如今還是這個樣子。我這回到家尋出了一部葉德輝的翼教叢編，讀了一遍，才知道這二十年的中國實在已經有了許多大進步。不到十年前，

那些老先生們，如葉德輝王益吾之流，出了死力去駁康有爲，所以這書叫做翼教叢編。我們今日也痛罵康有爲。但二十年前的中國，罵康有爲太新；二十年後的中國，却罵康有爲太舊。如今康有爲沒有皇帝可保了，很可以做一部翼教續編來罵陳獨秀了。這兩部『翼教』的書的不同之處，便是中國二十年來的進步了。

民國七年一月

易卜生主義

一

易卜生最後所作的我們死人再生時(When We Dead Awaken)一本戲裏面有一段話，很可表出易卜生所作文學的根本方法。這本戲的主人翁是一個美術家，費了全副精神雕成一副像，名爲『復活日』。這位美術家自己說他這副雕像的歷史道：

我那時年紀還輕，不懂得世事。我以為這『復活日』應該是一個極精緻，極美的少女像，不帶着一毫人世的經驗，平空地醒來，自然光明莊嚴，沒有什麼過惡可除……但是我後來那幾年，懂得些世事了，纔知道這『復活日』不是這樣簡單的，原來是很複雜的……我眼裏所見的人情世故，都到我理想中來，我不能不把

這些現狀包括進去。我只好把這像的座子放大了，放寬了。

我在那座子上雕了一片曲折爆裂的地面。從那地的裂縫裏，鑽出來無數模糊

不分明，人身獸面的男男女女。這都是我在世間親自見過的男男女女（二幕）

這是『易卜生主義』的根本方法。那不帶一毫人世罪惡的少女像，是指那盲目的

理想派文學。那無數模糊不分明，人身獸面的男男女女，是指寫實派的文學。易卜生早

年和晚年的著作雖不能全說是寫實主義，但我們看他極盛時期的著作，儘可以說，易卜生

的文學，易卜生的人生觀，只是一個寫實主義。一八八二年，他有一封信給一個朋友，信中

說道：

我做書的目的，要使讀者人人心中都覺得他所讀的全是實事。（尺牘第一五九號）

人生的大病根在於不肯睜開眼睛來看世間的真實現狀。明明是男盜女娼的社會，

我們偏說是聖賢禮義之邦；明明是臟官污吏的政治，我們偏要歌功頌德；明明是不可救藥

的大病，我們偏說一點病都沒有！却不知道：若要病好，須先認有病；若要政治好，須先認現

今的政治實在不好；若要改良社會，須先知道現今的社會實在是男盜女娼的社會！易卜生的長處，只在他肯說老實話，只在他能把社會種種腐敗醜惡的實在情形寫出來叫大家仔細看。他並不是愛說社會的壞處，他只是不得不說。一八八〇年，他對一個朋友說：

我無論作什麼詩，編什麼戲，我的目的只要我自己精神上的舒服清淨。因為我們對於社會的罪惡，都脫不了干係的。（尺牘第一四八號）

因為我們對於社會的罪惡都脫不了干係，故不得不說老實話。

二

我們且看易卜生寫近世的社會，說的是一些什麼樣的老實話。第一，先說家庭。

易卜生所寫的家庭，是極不堪的。家庭裏面，有四種大惡德：一是自私自利；二是倚賴性，奴隸性；三是假道德，裝腔做戲；四是懦弱沒有胆子。做丈夫的便是自私自利的代表。他要快樂，要安逸，還要體面，所以他娶一個妻子。正如娜拉戲中的郝爾茂，他覺得同他